

# 「便利的誤解」的歷史： 韓中相互認識的軌迹

• 白永瑞

## 一

在二十一世紀的東亞，會形成怎樣的地域秩序？這一問題是關係到韓中兩國和平與發展的重要課題。可是，如果我們在展望新秩序之時，重視行為主體的認識、意圖等因素的作用，那麼其中最具意義的應是居住在東亞地域之內的人民具有怎樣的相互認識。所以筆者一直對東亞人的相互認識這一主題抱有濃厚的興趣，這裏只打算考察一下韓國人和中國人間相互認識的形成與演變。

一般說來，一國的對外認識是由個人的、局部的對外認識積累而成的，所以發生誤解的情況也很多。特別是在東亞歷史上，往往與實體間的相互認識相脫節，在觀念上抱有超越對方的優越感，通過「便利的誤解」來維持相互關係的情況也不少。實際上，正如下面將看到的，韓國人的中國認識(或中國形象)與中國人的韓國認識(或韓國形象)，在很多情況下即表現為以「便利的誤解」為基礎的刻板的陳腐形態。正因為如此，兩國的相

互認識不是固定不變的、絕對的，而應將其視為歷史的產物，是相對的，這種歷史的觀點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也就是說，我們有必要結合韓中(進而整個東亞)關係形成的歷史狀況，分析韓國人和中國人的相互認識。筆者在這裏只想從韓中相互間之「所知的」與「所欲知的」(或所期待的)兩個側面相互滲透的動態認識過程，來把握韓中相互認識的演變軌迹。

## 二

首先擬分析一下傳統時代中國人對我們韓國人是如何看待的。

眾所周知，傳統時代的中國人是從東夷族出發來認識韓國人的。他們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儒教文化和統治權就由這個中心像波浪一樣向外擴展，這一秩序就構成了中華世界，或被稱為朝貢體制。在這一體系之下，離中心愈遠，也就意味着離文明的影響圈愈遠，也就會被視為夷狄。但是朝鮮在這一體系中具有特殊的意

傳統時代的中國人是從東夷族出發來認識韓國人的。他們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儒教文化和統治權就由這個中心像波浪一樣向外擴展，這一秩序就構成了中華世界，或被稱為朝貢體制。在這一體系之下，離中心愈遠，也就意味着離文明的影響圈愈遠，也就會被視為夷狄。朝鮮在這一體系中被視為「文明化的夷狄」。

\* 本文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召開的「思想史上的認同問題：國家、民族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13日至14日)上宣讀。

義，朝鮮被視為一種「文明化的夷狄」。儘管如此，從朝貢體制的角度來看，朝貢國的形象在中國人的認識中明顯處於主導地位。眾所周知的，中華世界並不是近代意義國際關係中的支配—被支配的關係，朝貢秩序標榜王道思想，這是明顯的不同。但是中國根據自身的處境或需要，有選擇地對周邊民族施以武力，強迫其服從，這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從被視為「模範的朝貢國」的朝鮮同明(清)的關係來看，明為了防範朝鮮可能對遼東地域的挑戰，一方面以征伐戰爭相威脅，另一方面也增加朝鮮的朝貢次數，推行懷柔政策(「獨厚朝鮮」)，所以對朝鮮的政策也具有兩面性<sup>①</sup>。可是，我們不可忘記的是還存在與此相連的另一種朝鮮形象，即從風俗習慣方面來描繪的朝鮮形象。勇猛，善於騎射，愛清潔，擅長歌舞的民族形象也是由來已久，這種形象從對高句麗、馬韓、辰韓等的風俗的描述中已經定型化了，並且隨後在對朝鮮人的描述中也時常出現。

進入十九世紀後，這種認識隨着傳統秩序開始瓦解，也不能不發生變化。特別是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在中華秩序中從來就處於偏邦地位的日本居然打敗了中國，對中國來說不能不是奇恥大辱。此後西方文明作為普遍的文明被接受，於是文明觀發生了大轉換，對朝鮮也不得不隨着東亞國際關係的變化而重新加以定位。

當然，清末的中國精英最初也試圖以西方的帝國主義秩序為樣板，將朝貢關係轉化為實質性的支配—從屬關係，即致力於「中華帝國的近代改編」。實際上，在壬午軍亂以後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在漢陽駐扎着中國軍隊，通過朝鮮朝廷內的親清勢力對朝

鮮的內政和外交發揮影響力，追求對朝鮮的實際控制權。但是經歷了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為日本所敗，不得不承認朝鮮為「獨立國」。

從那以後，為了應付不斷變化的東亞國際關係，中國對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是以「反面教材的朝鮮形象」回過頭來反思中國自身。清末的維新派通過突出日益沒落的朝鮮的「亡國像」來警醒中國人民。這種類型的韓國認識在革命派身上也有體現。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在1910年代對殖民地朝鮮也持否定態度，並因而發表了殖民統治是不可避免的選擇這種肯定殖民主義的言論。現在出版的陳獨秀選集中，有的版本將這些內容刪除了，這裏不妨引用一段。陳獨秀說<sup>②</sup>：

朝鮮地小民偷，古為人屬，君臣貪殘，宇內無比。自併於日本，百政俱興，盜賊斂迹，訟獄不稽，尤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興復舊主，力抗強鄰，誠見其損，未睹其益。

中國人的這種韓國認識，隨着1919年爆發的三一運動的真相傳到中國而發生了一些變化。朝鮮人不怕犧牲的反抗精神，以及對和平、平等、自由的崇高意識，顯然給當時的中國人以很深的印象。可是強調在朝鮮這樣的小國發生如此規模的抵抗運動，也是為了促進中國人自己的奮發。所以中國人在將三一運動作為「革命的新紀元」而給以崇高評價的同時，其暗含的意圖也不可忽視。與此相同，甚至中國對三一運動的反應也是受到將朝鮮視為反面教材的思路所影響。

中國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東亞局勢急劇變化，中國與韓國的聯合運動

中國對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是以「反面教材的朝鮮形象」回過頭來反思中國自身。清末維新派通過突出朝鮮的「亡國像」來警醒中國人民。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在1910年代對殖民地朝鮮也持否定態度，他說朝鮮：「自併於日本，百政俱興，盜賊斂迹，訟獄不稽，尤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興復舊主，力抗強鄰，誠見其損，未睹其益。」

也迅速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為打消中國人心目中朝鮮的反面教材形象，取而代之以聯合的夥伴形象提供了契機。這種變化從中國人描寫韓國人抗日鬥爭的文學作品中可以得到一些反映。可是在這種認識變化中，因兩國勢力的現實利害關係，朝貢國形象的變異形態也有了繼續存在的餘地，對此也不容忽視。

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東亞冷戰秩序形成，朝鮮半島出現分裂狀態，因此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的韓國認識也呈現出分裂狀態。從冷戰陣營的立場來看，北韓是「血盟」，南韓是敵對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是美國的附庸），這種認識佔據主導地位。這種認識發生動搖，是1980年代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的事情了。從那時起，中國人不再對韓國持否定態度，而逐漸接受其作為新興富強國家的正面形象。到1992年韓中關係正常化以後，兩國的交流急速增加，不僅將韓國視為新興富強國家，並希望從韓國的大眾文化中尋找自己所缺失的東西，於是出現了所謂的「韓流」現象。成功實現現代化的韓國人氣質（主要是堅忍性和集團主義），以及現代化的洗練的生活方式，這種刻板化的韓國人形象與實際的韓國人形象被等同起來<sup>③</sup>。不顧實際，僅從觀念上認識對方的這種「便利的誤解」的歷史，今天仍然在促動着中國人在日常世界中的欲望，這種認識方式仍在延續。

### 三

那麼，韓國人的中國認識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軌迹呢？下面將對這一問題稍做考察。

在1876年開港以前，朝鮮在朝貢秩序中處於朝貢國的地位，中國則是其事大的對象，朝鮮人的中國認識的主要特徵自然是將中國視為「上國」或「大國」。這裏所說的「大」不僅僅是指地理、物質方面的地大物博，也包括文化方面，以中國為文化的中心。但是這種地位不是固定不變的。明亡而滿清入主中國以後，朝鮮認為只有朝鮮才是中華思想的繼承者，這種優越意識強烈地表現出來。於是朝鮮在以小中華自居的同時，也將中國的文化意義與地理意義分割開來，但是仍然未能從根本上擺脫以中國為事大對象的認識框架。

這種中國認識，由於傳統時代中國人和韓國人相互接觸的機會極為有限，在相互疏遠的狀態下得以長期維持，幾乎形成了固定不變的中國形象。但是十九世紀末朝鮮開港以後出現了新的情況，進入朝鮮的中國商人和士兵為朝鮮人提供了直接接觸中國人的機會。隨着直接接觸的增加，在因中國商人和士兵而受到侵害或威脅的朝鮮人心目中，原來觀念上的中國形象開始崩潰。當時被派遣到朝鮮後非法滯留的中國士兵（「游勇」）尤其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問題<sup>④</sup>。另一方面，為了應對日本所造成的危機狀況，將中國視為命運共同體，試圖依賴中國的親清意識也因之出現。可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面對這一現實，韓國人的中國認識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甲午戰爭以後，朝鮮人的文明觀發生了根本轉變，自然帶來了新的中國認識，筆者在以前的文章<sup>⑤</sup>中曾將其分為三種類型。1、「賤視的清」認識：朝鮮的激進改革派不再將中國作為世界文明的中心來加以崇尚，反

1876年以前，朝鮮人的中國認識的主要特徵自然是將中國視為「上國」或「大國」；但是滿清入主中國以後，朝鮮認為只有朝鮮才是中華思想的繼承者，這種優越意識強烈地表現出來。於是朝鮮以小中華自居，將中國的文化意義與地理意義分割開來，但是仍然未能擺脫以中國為事大對象的認識框架。

#### 四

而視為近代文明的落伍者。他們對中國人加以賤視，以為中國人「卑賤，愚昧，骯髒，無愛國之心」（《獨立新聞》，1896年4月25日）。與此相反，日本被視為新文明的先驅者。2、改革楷模的中國：穩健開化派對清末中國的維新運動十分關心，對此抱有非常大的希望。3、東洋和平的一員，即勢力均衡的主軸之一的中國：從追求黃人種聯合的東亞三國連帶論來看，中國作為東亞勢力均衡的主軸之一，其作用受到肯定。

這種三種類型的中國認識，在隨後的二十世紀，以今天，都在不斷延續或變化。在淪為日本殖民地的1910年代初期，同情或參與了中國辛亥革命的一部分朝鮮人中間，對採取共和政體的中國是作為改革的楷模來加以認識的，而日帝強佔期「賤視的中國」認識類型似乎處於比較優勢的地位，這當然是受日本蔑視中國思想的影響。1910年代以後，隨着朝鮮工業化的發展，大批中國勞工和商人湧入朝鮮，朝鮮人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同他們進行競爭，這似乎也為「賤視的中國」觀提供了某些具體的根據（例如，金東仁在1925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土豆》中塑造的中國人形象）。與此相比，「勢力均衡的主軸之一的中國」認識類型對未能建立獨立自主的國民國家的殖民地朝鮮來說，自難引起人們的興趣。儘管如此，以活動在中國的獨立運動家為中心，朝鮮民間為抗日而希望實現韓中聯合，並隨東亞形勢的變化而試圖擺脫日本化的認識體系的《朝鮮日報》、《東亞日報》等朝鮮人所辦的報紙，以廣闊的視野，客觀報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從這些報導中也可以找到這種認識類型的一些影子。

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之後，朝鮮半島又出現了南北分裂，分別被編入不同的冷戰陣營，於是對中國的認識也出現分裂。分裂之後，儘管一部分報紙並不願意僵化地看待中國國內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內戰，而將其視為中國革命過程的繼續，但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尤其是1950年爆發的韓國戰爭還是對韓國人的中國認識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中國對北韓人來說是「同盟國」，然而對南韓人來說卻是敵國（「敵性國」）。在鐵幕阻隔之下，相互接觸成為不可能，所以這種中國觀也得以長期維持，並處於支配地位。這種將中國作為他者而差別化的認識傾向，也可以說是「賤視的中國」認識類型的一種變種。

可是到了1970年代初，以中美建交為契機，中國恢復了對東北亞地域秩序的影響力，「勢力均衡的主軸之一的中國」認識類型又開始復活（與此同時，對所謂「自由中國」、中國傳統文化守護者台灣的關心減弱）。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敵國認識依然處於支配地位的1970-1980年代，實際上「改革楷模的中國」認識類型也開始復活。要求社會變化的南韓進步學生和知識份子勢力對中國大陸展開的規模巨大的人類生存方式的社會主義新試驗（其頂點就是文化大革命）抱有濃厚的興趣，以此來反觀南韓社會，批判南韓的開發獨裁體制。這有助於糾正因冷戰思維方式而歪曲了的中國認識，但是他們只想拿中國形象與韓國相對照，缺乏對中國現實的全面認識，這是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

甲午戰爭以後，朝鮮人的中國認識可分為三種類型。1、「賤視的清」認識，即視中國為近代文明的落伍者。2、改革楷模的中國：對中國的維新運動抱有很大希望。3、東洋和平的一員，即勢力均衡的主軸之一的中國。韓戰爆發後，中國對南韓人來說是敵國，可以說是「賤視的中國」認識類型的變種。到了1970年代初，中國恢復了其影響力，「勢力均衡的主軸之一的中國」認識類型又開始復活。

自1980年代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特別是1992年南韓同中國建交以後，韓國人的中國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在脫冷戰的過程中，直接接觸的機會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並擴散到社會各階層，於是中國各方面的情況都傳到韓國。那麼，原來的三種認識類型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如果分析一下韓國出版的各種旅行者所寫的中國遊記中所反映的中國認識，首先給人的感覺就是原來「賤視的中國」認識類型有復活的趨勢。不清潔、飲食氣味重、不親切、缺乏廉恥、腐敗、唯利是圖等，都被認為是不夠文明化的社會主義體制的產物，並加以蔑視。這是用韓國的經濟成就和漸進的民主化作為尺度來衡量中國現實的結果<sup>⑥</sup>。不用說，這表明十九世紀末以來的進化論的文明史觀依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可是，也有些遊記作者對最令人厭惡的隨地吐痰的聲音也處之泰然，而將各種氣味作為文化的主要特徵而加以接受，並認為這種態度是適應異文化的鑰匙，中國認識上的這種小變化也很值得我們重視<sup>⑦</sup>。

此外，「改革楷模的中國」認識類型也不再像從前那樣僅僅從理念上認識中國，而是在考察了中國社會的特定現實後得出的結論。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對中國女性相對具有較高地位的評價。「兩性之間沒有相互壓迫與被壓迫的社會」（朴，頁74），「與性有關的無聊玩笑或令人不快的行動」（韓，頁295）行不通的社會，女性旅行者更容易得出此類認識。毋庸置疑，由於韓國在制度上對女性不公平，以及社會認識的落後，使她們感到羞愧，這種認識也就是這種心理所產生的條件反射。其實這也正好可以說明，韓國

人試圖從中國那裏尋找其「所欲知的」東西。這種認識類型，從1990年到中國旅行的女性文人真心希望中國維持「未經污染的環境和未經污染的意識」，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裕並重的文句中可以找到一些端緒。

「勢力均衡的主軸之一的中國」認識類型逐漸被不斷成長的二十一世紀強國的中國形象所取代，於是中國威脅論的虛與實在中國問題專家中也成為爭論的焦點。作為韓國人，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對具有「廣大的國土和市場，豐富的資源，龐大的人口，以及華僑組織和資本」的巨大的「中國號」向何處去漠不關心（韓，頁112）。

可是，中國對鄰國可能造成的威脅，不管是來自中國的對外膨脹，還是因為中國自身發生內亂，其規模之大都是根本性的、整體性的。有趣的是，這種「大」有時也會成為對中國持肯定態度的根據。也有人提出了「土地廣闊，心胸也更開闊」，「空白多是一件好事，雖然多少有點無秩序，但是這也意味着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的見解（朴，頁86-87）。再者，規模的巨大也與中國人對於作為歷史體、文化體的中國的自負心直接相聯，對此也有人提出要從積極的方面加以理解。「中國人對自身的文化和歷史，以及認同性的自負心」應給予很高的評價，「事實上這種飽含自負心和民族魂的『發展』不正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嗎？」因而強調「我們不僅要注意中國的『變化』和『速度』，更應深入分析中國人的這種自信感」（韓，頁318）。

由此可知，貫穿中國的昨天和今天，深入理解中國變化的內在動力的可能性已經為韓國人打開了，我希望這意味着韓國人的中國認識形成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韓中兩國的關係如

韓國旅行者的遊記中所反映的中國認識，首先給人的感覺是「賤視的中國」認識類型有復活的趨勢。缺乏廉恥、腐敗等被認為是不夠文明化的社會主義體制的產物，並加以蔑視。而「改革楷模的中國」認識類型是在考察了中國社會的現實後得出的結論，比如，對中國女性具有較高地位的評價。「勢力均衡的主軸之一的中國」認識類型則逐漸被中國成長為二十一世紀強國的形象所取代。

此密切地相互依存，以至於感覺到「北京用水沖洗一遍，我國的米價就會上漲」(韓，頁318)。毋庸贅言，目前韓國人的中國認識也正是這種歷史狀況的產物。

## 五

上面考察了韓國和中國相互認識的演變軌迹，那麼它們對韓國和中國將來的關係形成有甚麼意義呢？到二十世紀末，隨着相互接觸增多，比較多樣的、均衡的認識階段的出現，相信對兩國互惠關係的形成會有積極的作用。可是，從韓國人的中國認識的三種類型(特別是「賤視的中國」認識類型)依然存在的事實來看，進化論的文明史觀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一直對韓國人和中國人的相互認識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我們對兩國關係的前途還不容樂觀。

近代以來，以國民國家為歷史發展的原動力的發展階段論普遍被人所接受，韓中兩國的相互認識也正是從這一視角認識對方的結果。在這種歷史意識的支配之下，也許各國圍繞在東亞位階秩序中形成的歷史記憶而相互對立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為了寫出真正和解的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我們不僅需要具有以東亞地域為一個單位的視角，還應從整體上把握在東亞近代史的位階構造中形成與演變的歷史記憶的多重性，同時還必須在克服近代(即現階段的脫殖民和脫冷戰)的過程中，尋找解決因民族感情而導致的各國間矛盾構造惡性循環的辦法。如果從這種觀點來重新審視一下所謂韓國和中國的相互認識這一主題，其實這一主題也不僅僅是韓國和

中國兩者間的關係，而是整個東亞情況的產物。因此，為了實現二十一世紀東亞的和平與繁榮，韓國人的中國認識和中國人的韓國認識(進而東亞人的相互認識)並不能僅僅依靠相互接觸的機會增加而改善，只有我們「作為回過頭來審視自我中的東亞和東亞中的自我的主體」，形成了某種認同性之後，才可能真正徹底改觀。

### 註釋

- ① 朝貢制度是明朝初期制度革新和體系化的產物，被規定為「模範的朝貢國」的朝鮮與明(清)的關係在歷史上是一個特例，有人指出在分析前近代的東亞國際關係時過份加以強調或援用，也是「中國中心的文化論」的產物，這種批判主張也頗值得注意。參照Peter Yun：〈西方學術界朝貢制度理論的中國中心的文化論批判〉，《亞細亞研究》(首爾)，第二十五卷第三號(2002)。
- ② 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15。
- ③ 李琮敏：〈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看韓國的視角〉，《中國之窗》，創刊號(2003)。
- ④ 相關的報導在1882、1886和1887年的《申報》中經常出現。
- ⑤ 拙著：《東亞的歸還：探尋中國的近代性》(首爾：創作與批評社，2000)，頁166-98。
- ⑥ 俞長根：〈修交以後韓國人的中國旅行記中表現出的中國觀〉，東洋史學會2002年秋季發表會要旨。
- ⑦ 主要通過分析韓飛野的《中國見聞錄》(首爾：綠林，2001)和朴敬利的《萬里長城的國家》(首爾：東光出版社，1990)得出的結論。下文引此二書，只註頁碼。

以國民國家為歷史發展的原動力的發展階段論普遍被人所接受，韓中兩國的相互認識也正是從這一視角認識對方的結果。為了寫出真正和解的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我們不僅要有以東亞地域為一個單位的視角，還應從整體上把握在東亞近代史的位階構造中形成與演變的歷史記憶的多重性，同時還必須在克服近代的過程中，尋找解決因民族感情而導致的各國間矛盾構造惡性循環的辦法。

白永瑞 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會長。